

冯其庸:年轻人要多识繁体字

■本报记者 李芸



“生活就是读书,读书就是生活”,“读书是自我造就、自我成才的唯一道路”,当走进著名红学家、书画家冯其庸先生的家时,对先生的话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冯先生住在北京东六环外一个叫张家湾村的地方。二层小楼中一共有6个书房,一楼两个,一个主要收藏戏剧和明清小说并兼做客厅;另一个收藏各种古董和艺术珍品兼做画室。二楼一个收藏文学作品,一个收藏线装书和书画作品,一个收藏西部和敦煌的文献,一个收藏历史类和红学类书籍。记者拜访冯先生时,他正读一套35卷本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谈到读书治学之道,88岁的冯先生娓娓道来,原定半个小时的采访差不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

识字是读书第一步

“读书要先识字。”冯先生解释说,“我说的字不是你们现在学的简体字,是繁体字,甚至是繁体字更古老的古体字。”

冯其庸识古体字算是自学成才。初中时,偶然在旧书摊上买到一册《水云楼词》,该书著者蒋春霖,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大词人。这不仅是冯其庸喜欢读“词”的开始,也是他识古体字的开始。

《水云楼词》好用古体字,“开始我不认识,但小孩子好奇心很重,上下文一联系,在多篇词作中一分析,反复琢磨,也就慢慢认识了。”后来冯其庸买到淮海词人丁至和的《十三楼次第谱》,也是一本用了大量古字的书,更增加了他对古字的认识。

再之后,冯其庸在上海无锡国专读书,便经常去福州路的书店找古书看,“那时候书店特别好,可以在里面随便看书,想买就买,不买还能借回去看。有一个温知书店,我和经理王兆文成了好朋友,有时我看书太晚了就和店里的伙计一起搭个铺盖睡在书店里,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看书。”

冯先生说:“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没有中断,靠的是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钟鼎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一脉相承。虽然现在汉字简化了,但古籍都是用繁体字记载的,如果不认识繁体字,如何能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历史传统、思想传统?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仅仅读别人转成简体字的书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起码大学文科设置繁体字课程,让文科学生都能认识读、运用繁体字。”

对个人来说,识繁体字是读书的第一步,对国家来说,培养识繁体字的年轻人也极为迫切。冯先生举例:“关于钓鱼岛争端,最近在美国、英国、日本都发现了古地图,上面明确标识钓鱼岛属于中国,钓鱼岛这三个字还没有太大变化,我们能认识。但如果是其他繁体字,我们不认识的,那这些重大意义的文献资料岂不是没用了?”

现在不仅台湾、香港地区,我国的周边国家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也都在读繁体字,难道将来我们的历史文化要让他们来研究吗?文字都不认识,传承就无从谈起。

冯先生又言:“有人说推广简体字是减轻负担,但我看反而给年轻人增加了负担,学了一套简体字,还得再学繁体字。其实学繁体字并不难啊,我小学五年级水平,都能自学学会,年轻人学繁体字肯定没有想象的艰难。”

读书要“横读”加“竖读”

“过去学科没有现在分得细,如果研究的领域分得太细,可能难以产生通才式的人才。”冯先生认为,学问之间是彼此关联、互相激发的。读书也是一样的道理。搞文学的不懂历史,搞历史的不懂文学,都会事倍功半。文学与历史,甚至还有哲学、民俗等学科,本来就是共生共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不能全面涉猎,怎么可能发生联想,获

得精深的见解?

“所以,我认为学科可以越分越细,读书却该越读越宽,惟其如此,才能融会贯通,才能更全面地看世界、想问题。”冯先生说。

但读书若只求杂又难免泛泛、流于一般水平,因此在读书“宽”之后还得读“专”。冯先生说自己开始研究《红楼梦》时,也有些担忧:《红楼梦》研究都有百余年历史了,能出新东西吗?后来他从历史角度查曹雪芹的家世,查出很多史料,结合曹雪芹家世的兴衰,再结合《红楼梦》的书、脂砚斋的评注,写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读书不能只在书斋里做,还要从实践中求真

知。譬如冯先生对“项羽不是死于乌江”的评判,他说,“《史记》里明确记载: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痛而不自责,过矣。东城我实地去了,在现在安徽省定远县境内,离乌江240华里。司马迁明明白白地讲‘身死东城’了,怎么能到乌江呢?读书还要结合实际认真调查,历史真相才会明白”。

冯先生说,读书既要连类来读,又要分类来读,连类是读通史、综合史,是横读;分类是读通专史、专书,是竖读。“凡书都有其独到之处,也有其不到之处。我们取其独到之处而知其不到之处,取其独到之处,则只有所得,知其不到处,则明以谋补也。”

阅读分享

“《三国演义》伴随我多年”

影响我一生的阅读,如果从治学上来说,应该是蒋春霖的《水云楼词》,从那时开始我接触古体字,认识古体字,是我后来阅读大量古籍的基础。如果从写作上来讲,《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诗源》、《东莱博议》、《浮生六记》、《西青散记》、《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对我影响最大。从做人上来说,最重要的当属《三国演义》、《水浒传》、《论语》和《孟子》了。那时我夜以继日地沉浸在这些书里,有很多我都能背诵。后来这些书我一直带在身边,现在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保存下来了。

我小学上到五年级,抗日战争爆发。我当时生病有一个礼拜没有上学,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病好后我背着书包上学,忽然日本飞机在头上一转,撒下来大批传单,拣起一看,上面印着“暴蒋握政权,行将没落”。走到学校里,学校早已关门了,老师一个也不见了,我只得转身回家。我书包

里还装着一本《三国演义》,是学校的图书,也无法还了,这就成了我失学后的一本最佳读物。从此,《三国演义》伴随我好多年,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无书可读,只好反复读这本书,到后来有许多段落的文字,许多人物对答的精彩语言,许多回目,我都能背得出来。《三国演义》有些半文言,但多读几遍也就没什么困难了,这培养了我阅读古典小说、古典文学的兴趣。

后来我又借到了《水浒传》,看着真带劲,我看的是金圣叹的评本,细读金圣叹的评,启发我边读边品味。那时我很喜欢《水浒传》,它情节更紧张,它讲的是对朋友要仗义、对自己的国家要爱护,对我影响很深。《论语》我记不起来是如何借到的,但它的“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等这样的道理,成为我做人的准则。《水浒传》、《论语》等很多书,我都是读到几乎能背诵。

(本报记者李芸采访整理)

人人都爱大熊猫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你知道大熊猫本叫猫熊吗?为什么大熊猫会有六根手指?刚出生时比一根钢笔还要短的大熊猫是如何长成后来的体态丰盈?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宝贝大熊猫》,这些疑惑将一一得到解答。

四川卧龙是大熊猫的故乡,卧龙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受到中外各界高度关注,来自国内外的志愿者和游客络绎不绝。5年前,中国和平出版社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合作,为广大熊猫迷们奉上了这本集科学性、趣味性、观赏性与收藏性于一身的精美画册。

大熊猫的小百科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濒危、最珍稀的物种之一,被誉为‘动物活化石’和‘中国国宝’。”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胡锦矗首先确立了大熊猫在生物种群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与人类的亲密关系。

作为《中国宝贝大熊猫》的编者之一,庞旸用“四性”——系统性、完整性、趣味性、新颖性总结此书在内容上的特点。本书先从大熊猫的进化史入手,介绍这位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接着讲述大熊猫的形态特征与生活习性,大熊猫的婚恋与繁殖、邻居和朋友,《中国宝贝大熊猫》也都作了详细介绍,可以说是关于大熊猫的

常言道,“慢工出细活”,这本书的出版过程



《中国宝贝大熊猫》,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编,中国和平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也颇为波折,应称其为“五年磨一剑”磨出的精品。早在2007年,中国和平出版社与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签订了合作出版协议。

2008年5月12日下午,庞旸对那一天记

忆犹新。当庞旸拿着已完成的初稿与一位加拿大的翻译学者在翻译合同上签字时,地震发生了……

庞旸辗转与卧龙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卧龙位于震中,损失很大,基础设施全部被毁。卧龙的工作人员全力抢救,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与熊猫的安全,但出书的事也随之搁置下来了。

卧龙的救灾、重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面临的困难是外人难以想象的。于是,把这本书编得更好,成为出版人对卧龙重建可以作、应该作的贡献。在对原有内容和形式进行修改完善的同时,此书编者还加进了地震中、地震后的大熊猫,以及保护区重建等新的内容。

重提出版是在2010年夏天,地震后,卧龙大熊猫都被“寄养”在碧峰峡和其他地方。卧龙的重建工程在紧张进行,往返卧龙的途中常会遇到滚石、泥石流,既艰难又十分危险。中国和平出版社决定将出书的时间再推迟,待重建工程基本完成、“熊猫回家”的时候,再将此书作为对历经灾难的卧龙的献礼。

胡锦矗认为《中国宝贝大熊猫》一书的出版虽历经坎坷,但终于与读者见面,正如卧龙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的重建,“终于把一个更大更先进的新卧龙还给了祖国人民,而《中国宝贝大熊猫》也恰如新卧龙一样,浴火重生!”

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王石口述、时代记录整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王石给人的印象,有时熟悉,有时陌生。熟悉的王石,是停留在商业史里的那个人。当过兵的高干子弟、玉米贩子、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倒爷、体制改革的风云人物、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的创始人,及一大堆荣誉职务。他还是深圳最早的建设者,1979年,王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罗湖做一名给排水技术员。

十多年来地产热潮中,人们还从商业的角度熟悉着王石和他的万科。比如在1998年1月,王石和朱基基的那次对谈,被无数人写进文章或书里,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起点。通过追溯,人们又发现,通过股份制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万科成为了中国首批上市公司,000002的股票代码成为了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再比如,作为一本企业内刊的万科周刊,不仅成为了最好的地产杂志,还成为了万科的“黄埔军校”,不少地区总经理一级的管理者,都是从这份杂志走出去的。

王石还是个活在管理学读物里的人,中国的商业文化就是这样,习惯把企业家与企业紧密相连,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在机场书店的管理学架子上看到,一本本印着王石头像的书摆在那里,脑袋边上印着“学管理”一类的字体。

陌生的那个王石,处境有一点奇怪。他的所作所为同样为人熟知,同时又不被理解。他频繁地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但是又因为这些不被理解的动作,他不符合人们心里所想,不去做那些“应该做”和“可以做”的事,偏偏出离人们熟悉的王石。

这样的例子当然不少。比如说,对房地产市场的那次“拐点论”的预言,让看涨的声音嘲笑不已,再比如说,人们意外地发现,这个人突然从万科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又被解读为禅让让位;退下来的王石每天忙着登山、滑雪,一度被打上不务正业的标签;以企业家的身份为摩托罗拉拍广告,同样引起人们的一阵惊吸;在60岁的年纪去哈佛游学以及近些年的娱乐八卦。

这种情形有点像是石膏雕塑,每当石膏将凝、形象快要固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动作一番,不断刷新着人们对他的认识。

王石脚步不停地行进在熟悉、陌生两条线之间,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着,人们也因此越来越读懂这位企业家。登山爱好者、学者、哈佛学生或是其他身份的王石。而在最近的三年里,有人寸步不离地拍下了他的生活。最后又将载体转换,把影像变成这本《王石说:影响我人生的进与退》。就一个而言,日常生活平淡琐碎。但如果想要读懂一个人,那么,日常生活则是最理想的途径。它丰富、宽广,同时激动人心。

俗话说,五十知天命,王石已经61岁了,对于年过花甲的这样一个人,他的叙述,大概是可以引领外人走入自己心灵森林深处,共同体会自己生活中的进与退的。



蕾切尔·卡森

“只有一个地球”第一次成为全人类的共识。1980年,美国政府追授卡森美国普通公民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致辞中肯定了她的环保先驱者地位,称赞她“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是一个觉醒的春天”。

卡森深刻洞察了技术和进步背后隐藏的危险代价,并通过预言一种灾难性的可能惊醒了整个世界,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生命意识和自然意识。就在去世前不久,卡森还在一次演讲中发出警告:“合成化学物质的污染已经演变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而人类已经被迫成为这个特殊实验的对象。”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恐怕已有身陷其中、进入“角色”之感了。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为非法出版物作了界定,应为判断一本书是否为“非法出版物”的唯一标准。会议认为,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非正式出版物不该与非法出版物画上等号。

五年磨一剑

一本好书诞生的背后,往往有“故事”;同时,其影响所及,也贯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科普作家尹传红主笔的新栏目“书里书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故事。

一本好书诞生的背后,往往有“故事”;同时,其影响所及,也贯穿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科普作家尹传红主笔的新栏目“书里书外”,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故事。

只要春天还听到鸟叫,我们就应该感谢卡森。这句话或许有点儿夸张,但今天应该没人会否认,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当以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寂静的春天》问世为标志,而这部书将带来极大震撼的警世之作,恰恰因鸟儿的遭遇而促发。

1958年1月,出版过几部海洋科普读物并颇有些声名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1907-1964),收到马萨诸塞州一位住在鸟类保护区里的熟人、报纸编辑奥尔佳·欧文斯·哈金斯的来信,获悉滴滴涕(DDT)已造成保护区内的鸟类濒临灭绝,情况非常糟糕。

“去年,灭蚊飞机飞过我们的小镇,……喷洒了好几种致命的药……一下子毒死了我们七只可爱的鸣鸟。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门前捡到三只死鸟。它们都是些跟我们生活得很近、信任我们、在我们的树上筑巢多年的小鸟。”奥尔佳在信中悲愤地写道:“……所有的这些鸟儿死去的样子都很吓人。它们的嘴张得大大的,张开的爪子都痛苦地耷拉在胸口。”

奥尔佳希望卡森能利用她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的威望,影响政府官员去调查杀虫剂的使用问题,可卡森觉得给杂志撰写文章警示公众或许最为有效。然而,编辑们竟然都回绝了。那个时候,政府官员和科学家都把滴滴涕当成化学上的奇迹并为它欢呼;它的发明者、瑞士化学家保罗·米勒因此还获得了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卡森思之再三,下决心写一本书。她要让公众认识到,尽管滴滴涕曾经被认为

书里书外

“春天”的觉醒

■尹传红

是“人类的救星”,但它和其他杀虫剂实际上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杀手”,因而强效化学制剂的使用应更为谨慎、更有节制。

她很快便开始行动:收集资料,实地考察,调查访谈。起初,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她很容易就能从政府部门和图书馆得到她想要的信息。但是,当官员们发现她写的内容后,就不愿意再合作了,还有不少人试图阻止她的要求。

“我对杀虫剂的作用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害怕。我意识到这是一本书的写作素材。”后来回忆起1958年年初的日子,卡森这样说道,“我发现,作为一个自然主义者,对我非常重要的事物都受到了威胁,在我所能做的事情当中,没有一样是比写书更重要的了。”

断断续续地写了3年多,卡森终于完成一部名为《人类与地球对抗》的书稿。编辑建议把新书改名为《寂静的春天》,并在1962年9月将其推出。两周后,《寂静的春天》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一场巨大的风暴也随之降临:围攻和谩骂都来了,从“煽情”到“歇斯底里的女人”和“极端主义分子”,什么难听的话都有;甚至,卡森的单身状况也饱受嘲笑和挖苦。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施压要求禁止这本书的发行,并指责书中包含了“荒唐的错误”和“耸人听闻的推论”。

1964年4月14日,卡森因患癌症与世长辞。1970年,美国设立环境保护署;1972年,美国全面禁止滴滴涕的生产与使用;同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里程碑式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